香港政情　方靖之

「民陣」騎劫「七一遊行」作「公民抗命」靠害市民

「民陣」今年「七一遊行」申請在銅鑼灣東角道作起點，但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中，要求「民陣」在維園中央草坪出發，隨即惹來「民陣」的強烈反彈，指已多次向警方表示由維園草坪出發對遊行人士會構成潛在危險，並考慮就遊行起點「公民抗命」云云。「民陣」此舉等於是拿市民來「較飛」（註：冒險意思），令參與遊行的市民有惹上官非的風險，做法極不負責任。及後，在一些反對派政黨的「爭取」下，「民陣」最終決定還原基本步由維園草地出發，但一些激進派政黨組織，依然在鼓動市民在其他地區出發，並且中途插隊，以向警方表達不滿云云。

爭拗「出發地點」為遊行造勢

「民陣」挑起遊行出發地點的爭議，不但無理，更是故意製造事端。與上年一樣，由於維園球場已經被其他團體租借，自然不可能作爲「七一遊行」的出發場地，改爲在維園中央草坪出發，是最爲合適的方法，去年同樣如此，也沒有出現問題，亦沒有所謂「潛在危險」，何以「民陣」如此反應激烈？而且，「民陣」提出的其他選項，根本是不可行，東角道人流如鯽、車水馬龍，怎可能作爲以萬計市民遊行的起步站？至於「民陣」提出的其他地點，全部都是旺區，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參與市民。「民陣」故意提出一些不可行的選項，繼而批評警方反對其建議，根本是志在挑起事端，爲遊行造勢。

「民陣」拒絕在維園中央草坪出發，起初更表示不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呼籲市民照樣在東角道出發，這等如是鼓動市民參與違法遊行。根據法例，在不反對通知書所批准的地方以外加入遊行，將涉及參加非法集會罪。「民陣」如果拒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等如將「七一遊行」變成一個非法的政治行動。然而，「民陣」將「七一遊行」變成「公民抗命」，卻沒有向參加市民清楚告知，等如是將大批不明就裏、以爲參加合法遊行的市民，變成「公民抗命」的一分子，如果市民因此惹上官非，是否「民陣」承擔責任？「民陣」堅持不理會警方要求，不但騎劫遊行作「公民抗命」，更是罔顧市民的安全和利益。

「民陣」的建議在內部也引起巨大的爭議，不少立場較溫和的政黨組織都反對「民陣」的做法，「民陣」現時已經分裂成兩派，溫和派認爲市民沒有對維園中央草坪出發感到不滿，再花時間爭拗反而令不少市民因憂慮犯法而不敢出席，令遊行人數更少，建議接受警方的安排。激進派則指責溫和派退讓妥協，缺乏抗爭意志。但最終，在遊行出發點上還是溫和派佔上風，「民陣」決定維持在維園中央草坪出發，但激進派仍然不服輸，繼續呼籲支持者在其他地方出發和插隊。

激進派此舉根本是別有用心，目的是挑起警民摩擦，從而製造衝突。激進派近期接連發動的政治衝擊，全部都無功而還，失敗而回，參與人數零丁落索，社會反應冷淡。因此，他們一直希望利用「七一遊行」發動一場衝擊，將遊行變成「公民抗命」。他們故意在出發點上大做文章，不過是要製造事端，因爲對市民而言，在維園中央草坪出發根本無問題，也沒有表示反感，但「民陣」內的激進派卻將矛頭指向警方，甚至以此呼籲市民不必遵照警方安排，可以在任何地區出發。屆時，現場警員必然是勸阻甚至阻止他們遊行，隨時會引發現場混亂，甚至出現肢體衝突。激進派便可以此挑動市民衝擊警方防線，引發另一場的政治衝擊。

盲從民陣遊行或需負上刑責

因此，激進派才要在出發地點上挑骨頭，上綱上線指責警方，目的就是要煽動市民自行在不同地點出發，從而引發衝擊，讓他們可以渾水摸魚。激進派的行徑不但卑鄙，更是罔顧市民的安危。當日遊行很可能有以萬計的市民參與，過去「民陣」一直強調要和平遊行，就算有激進派要搞事，大都等待遊行結束後才「加插」行動。但現在按激進派的部署，市民在不同地點出發，隨時會引發警民衝突，造成混亂，誤傷他人。而且，在不反對通知書以外地方參與遊行將觸犯非法集結罪，如果發生衝突，參與市民隨時將負上刑責，請問「民陣」有沒有向參與市民講清楚？而不少市民都是扶老攜幼的出席，如果因此造成混亂令參與市民受傷，是否「民陣」承擔責任？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二十一周年，也是習主席視察香港的一周年。這一年間，香港的形勢出現根本性、持續性的好轉，民情趨穩、泛政治化歪風得到遏止、反對派在立法會的搞局也遭到限制。社會上各界聚焦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正密鑼緊鼓的推進。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之下，自然不利反對派催谷市民上街。所以，「民陣」才要藉起點問題製造爭拗。不過，法庭近期的判決已表明對違法行爲不會手軟，「民陣」如果仍然要騎劫遊行作公民抗命，把市民置於違法風險中，只會引起更多市民的反感，更加不會當反對派的爛頭蟑。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改「家規」符合民意

港事港心　葉建明

據媒體報道，早前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涉搶保安局女行政主任手機，促使立法會研究修改《議事規則》，懲處操守有問題的議員。而在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草案時，反對派議員多次攪亂會議秩序，再次引起公衆對修改《議事規則》的辯論。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認爲，正研究對多次驅逐離場的議員設罰則，包括應否禁止他們參與餘下立法年度的會議。他並說在不少其他國家的國會，議員被逐離場之後都有不同後果，「無論罰錢又好、停賽又好。」他強調，有關做法有英國國會的先例可循。

立法會多年的亂象顯示，立法會修改「家規」，整頓議會秩序很有必要，符合民意，符合香港長遠利益，必須盡快修改，已無妥協的空間。

這些年來，首先是暴力惡行進入了議會，扔香蕉、擲杯子、搶文件，主席台上圍攻主席，與保安發生肢體衝突，以千奇百怪的道具在議會內招搖……。其次，從2011年開始，「拉布」成爲議會常態。據統計，上一屆反對派就法定人數點數了近1500次，浪費超過450小時議會時間，耗費納稅人數十億公帑。這期間，一些民生問題的提案被拖垮，例如醫委會改革等等。

「拉布」阻礙政府施政，影響香港經濟社會正常發展。成爲市民深惡痛絕的痼疾。議會暴力與「拉布」也玷污了立法會的形象，令其權威性受到質疑。如果沒有任何制衡和懲處，長此以往，議員搗亂就會被合理化，後果難以想像。好在曙光初露。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說，議事規則委員會正在研究對多次驅逐離場的議員設罰則，包括應否禁止他們參與餘下立法年度的會議。

無規矩難成方圓。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11月釋法對議員宣誓提出規範，自此，議員以「港獨」話語或者不莊嚴宣誓、在議會倒插國旗等直接詆毀憲法和基本法的現象被禁絕。去年12月，香港立法會通過了修訂《議事規則》決議案。修訂主要內容均與防止反對派「拉布」有關，包括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由全體議員一半下調至20人；對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或動議，立法會主席可不予接納；主席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恢復會議或召開會議等。根據香港基本法75條提出修改的議事規則，獲得香港社會廣泛支持，也產生一定效果。

此次「一地兩檢」審議，立法會主席就是按照這一修訂的《議事規則》主持會議。梁君彥適時剪布合理合法。議員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無論議員本人還是社會都需要有明晰的認知。2014年，當時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兩年前剪布提出司法覆核，先後在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訴，最後又上訴至終審法院，在聆訊後亦被當場駁回。高院指出，《基本法》第73（1）條（立法會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是給予立法會整體的權力，而非給予個別議員根據個人意願行使權利干擾會議。高院的判決很清晰。這表明，議會權力是整體性權力，議員權力是局部性權力。議會的權力具有整體性、綜合性、結局性，而議員的權力具有個體性、分散性、過程性。議員的權力，並不能凌駕於議會的整體權力之上。

回歸21年了，社會在發展，香港在進步，依然沿襲港英那一套議會文化已經無法與時俱進，無法適應今天香港的需要。立法會修改「家規」，此其時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泉州社團聯會會長

增「高額長津」替「全民退保」

文滿林

首批「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於六月中發放。合乎領取資格長者可追補過去十三個月差額及該月份高額長津，最多可領取四萬多元。對於衆多合乎領取資格的長者來說，眞是有種喜出望外之感。爲捉襟見肘的生活帶來一時「鬆綁」。今年六月想必是全港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最開心大日子。

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月有三千四百八十五元，但有規限，即每月入息限額，單身人士爲七千八百二十元上限，資產爲十四萬六千元；夫婦兩人入息爲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元，資產上限爲二十二萬一千元。據政府有關資料顯示，全港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合乎領取「長者高額生活津貼」約有四十多萬，佔長者比例約百分之三十多。有不少因爲月入超額上限，以及資產超出上限「少少」而喪失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頓感有點不值和嘆息。尤其是收入和資產與上限只差不遠的「邊緣人」。若然能夠將入息和資產上限適度調整，相信會令更多的長者受惠，晚年生活會好過一些，安心一些。

三千四百八十五元的「津貼」，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目前不少社會人士和團體爭取所謂「全民退保」計劃，其目標也是在乎三千五百元左右，與此「津貼」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津貼」有所規限，月入不超過多少，資產不超過多少，才能合乎資格領取。而社會人士提出的「全民退保」計劃，則不需什麼收入上限及資產上限，即俗稱的「免審查」人人有份，皆大歡喜。這無疑是個公平公道的社會福利方案。

在香港來說，不是全然福利制度社會。當有社會團體提出推行「全民退保」計劃時，就面對不少反對聲音，包括專家學者和商界。究竟錢從何來，以及老人化問題越趨嚴重，都是政府必須考慮的議題。推行「西方式」的「全民退保」計劃有個別弊端。

個人之見，對於推行「全民退保」計劃，能實施當然好。退一步來說，由於各方面的因素所致，在短期內不能推行也無妨。問題是將今年六月中發放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有關規限，需要作出調整及提高。例如入息方面，單身月入上限七千八百元，在目前生活指數和物價，尤其住屋房租方面不斷飛漲的環境下，似乎有點吃力。當然有些月入只有四五千元（做雜工散工之類）及完全沒有入息的長者，單靠三千多元過活，如何生活則可想而知。總而言之，完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讓更多的有需要的長者領取每月三千四百多元，是對長者晚年生活的一種保障；從另一角度來說，在「全民退保」還未落實之時，完善和調整現時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不失是另一種「全民退保」的措施和方案。甚至比「全民退保」更具效益和實際。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修改新《土地法》可真正釋出善意

穆風

澳門政府有關部門處理「海一居」事件的方法，在社會引起較多討論。不過，政府仍然聲稱，提出解決方案，是出於善意，這不乏應和者。例如，兩位官委議員馬志成和陳華強發表聯合發言，指政府既想辦法幫助業主「上樓」，又退回印花稅，已是釋出了善意。

對照廣州最大爛尾樓「澳洲山莊」案例的話，便會見到澳門特區政府的「善意」方案，極具「澳門特色」，且也不失爲澳門管治的小寫照。「澳洲山莊」爛尾的源由與處理方式，與澳門「海一居」，有一個重要分別，那就是當局與「海一居」有更明顯的老樹盤根關係。在旁觀乃至着手解決「澳洲山莊」問題的過程當中，當局由始至終都較能維持局外者身份。但在「海一居」事件當中，澳門政府卻無法擺脫置身事外：一方面，「海一居」爛尾不乏「不可歸責」因素，政府本身也間接是爛尾樓形成的一個成因；另一方面，政府解決方案的重要部分，是承諾向購買私樓樓花的「海一居」業主，出售屬公共房屋、性質徹底不同的單位。雖然官員在記者會強調，方案並非補償或賠償，但與廣州「澳洲山莊」爛尾樓案例相比，澳門政府的介入程度自是分外突出。

話說回來，澳門政府的善意，仍然需要被肯定。以公帑資源「幫助」私樓業主「上樓」這樣特殊的政策，多少反映政府着力維持社會和諧的意願。問題是，政府在「海一居」風波所表現出的「善意」，力度還不夠。近年澳門社會愈趨明顯的撕裂，與有缺陷的新《土地法》是否關係密切？

從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都愈來愈清楚顯示，各方更傾向澳門應透過引入歸責條款，修改新《土地法》，以解決政府強行「一刀切」回收「不可歸責土地」所激起的社會矛盾。

香港經驗可供借鑒

令人慶幸的是，澳門政府已經逐漸看重了歸責問題，兩位司長的最新言論某程度上代表了一種正面的態度。對於有意見認爲《土地法》欠缺過錯責任原則，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日前稱，正積極研究有否需要修訂，但暫時沒有修法時間表。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日前稱，針對爲發展商重建設定時限的《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法案，政府可研究是否加入歸責條款，以處理行政失誤延誤發展的情況，從而增加未來法例執行的彈性。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一國兩制」的重要意涵，是澳門在回歸後五十年內，都是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國家政策，澳門資本主義體制健全運作與否，關係到國家利益。

同樣奉行「一國兩制」、同期進行「土地大辯論」的香港，便在土地管理範疇，爲澳門樹立了榜樣。於5月立法會答問大會，有議員便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否動用《收回土地條例》之類的政府權力，收回私人土地以作發展。林鄭月娥斷然回應，「即使我好有膽」，政府也不會隨意運用《收回土地條例》，主要原因是不能隨意侵犯私人產權，以防耗時的司法覆核接踵而至。林鄭確曾說到做到，她在2007–2012年間出任發展局局長時，政府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的次數，就曾暴跌。這說明，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依法辦事」並非「故事」的全部。

澳門特區政府官員與香港政府官員一樣深明此理，對公權力應用的認知與處事態度同樣成熟。但願對《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法案引入歸責條款的理性取態，能及早被應用到修改新《土地法》之上，向澳門社會釋出眞正的善意。

戰略思考　孫海潮

大變革時代的國際關係與中國戰略處境

大國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導致近年來國際關係格局分化改組和調整持續加速，今年上半年的表現更加突出。世界進入新的動盪期，現有國際秩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隨意性和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引起普遍擔憂。「美國孤立」與世界動盪成正比。

一、美國戰略焦慮導致國際關係格局大調整

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行爲規則由美國主導制定，從根本上對美國有利。冷戰後，美國成爲唯一超級大國，獨霸世界野心極度膨脹，先後發動了第一次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後又以反恐名義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進而策動「阿拉伯之春」推翻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和軍事干預敘利亞局勢。巨額戰略透支使美國從獨超地位迅速跌落。特朗普以「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口號當選，是美國選民否定以往政策和對傳統領導層失望後的選擇。特朗普的許多做法迎合了選民的心理，也迎合了精英階層對美國衰落戰略焦慮的擔憂，具有社會低層和政治上層的雙重基礎。

特朗普是西方世界民粹主義和極右保守勢力的總代表。「美國優先」勢必衝擊別國的利益，決策的隨意性和出爾反爾的性格以及急功近利的商人本性，更對現行國際關係格局造成始料未及的強烈衝擊。美國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導致了國際關係的失衡、失調和失序的混亂局面。在舊秩序已難以爲繼，新秩序難產的當前形勢下，這種混亂局面還將持續相當時間。

二、美國「以世界為敵」的做法引發衆怒和強烈反彈

美國在冷戰後橫行霸道和橫衝直撞，是世界安全態勢持續惡化的總根源。美軍所到之處生靈塗炭，一片廢墟，「世界苦美久矣」，特朗普卻說美國力和影響力下降是「美爲世界出力，世界坐享其成」，「世界欠美多矣」。特朗普認爲別國都佔了美國便宜，獲益最多者便是盟國，美國則受到「不公平待遇」。特朗普要求盟國足額交付保護費而且要把欠債都補上，對盟國領導人極盡傲慢和蔑視。默克爾在多種場合重申「歐洲要掌握自己命運」，是對美失望至極所發的感慨。

特朗普上任後先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繼去年北約峰會、G7峰會和G20峰會上與德英法意關係趨僵後，今年的G7峰會已被定性爲「慘敗」。歐盟和加墨印等國相繼宣布以對等措施回擊美貿易戰，批評特朗普「精神分裂症式的對外政策和貿易恐怖主義」導致嚴重後果。美與重要盟國關係爲二戰後最緊張時期。美把駐以色列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喪失巴以和平進程調解者角色，在阿拉伯世界形象進一步受損。從「禁穆令」到對非法移民零容忍，強行使2300多名兒童與父母分離；把發展中國家比作「垃圾國家」，把移民比作「畜生」。美俄戰略衝突有增無減。難以轉圜。美在世界範圍內的盟友實際上只剩以色列一家。

三、中美戰略衝突由潛在轉為現實，但美難以全力對華

美對華政策經歷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到解放後對華封鎖制裁到接觸加遏制的漫長過程。其間還發生了朝鮮和越南兩場慘烈的局部戰爭。上世紀80年代末後，西方對華政策的消極面一度佔據主導地位，對華實施全面制裁，後又恢復接觸中遏制的傳統做法。特朗普在發出「全世界佔美便宜，現在是還債時候了」威脅的同時，也認定中國的崛起是美歷屆政府對華政策失敗的結果。特朗普放棄在所謂人權和自由問題上對華施壓的一貫做法，改爲從台灣和經濟兩個問題上入手，發誓要使中國屈服。不只是要使中國不再「掠奪美國」，更要把中國的發展勢頭打下去。美與盟國貿易戰主要是經濟問題，對華貿易戰則更多出於政治考量。美戰略界始終認爲，中國將是美最終威脅，中美攤牌只是時間問題。「中美必有一戰」的叫囂不絕於耳。由於中國實力增長難以阻擋，因而也有中美「G2」共治的預判。從美國家戰略報告把中俄並列爲最大威脅，到所謂有史以來最大數額的貿易制裁清單，步步進逼，顯然是有備而來。此番中美衝突可視作爲一次預演，是能力、實力與定力的較量，需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

今天的中國已非抗美援朝時的中國，今天美國亦非冷戰後獨裁世界號令群雄時的美國。美國的戰略牽制沒有減少，而且在增加。**世界之大和矛盾之多，可供利用的機會自然就多。中國戰略迴旋餘地之大，與往昔相比已有天壤之別。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對商人總統特朗普有着難以割捨的吸引力，其他國家都在等待着填補一旦美國退出留下的「眞空」。德法英加日韓競相發展對華關係，奧地利總統和總理聯袂訪華更創下雙邊關係史先例**。

全體中國人民已徹底認清了美國的眞實面目，完全丟掉幻想，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萬衆一心迎接挑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緊迫感進一步增強。歷史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都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上合組織青島峰會的團結成功與G7加拿大峰會的爭吵失敗形成鮮明對照。我們應爲全球性大變革時代的到來做好應有準備。

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主任，原駐外大使